

編後絮語

韓思藝 本刊執行主編

歲序將盡，時維年終。回望過去一年的世界風雲與中國實踐，愈發清晰地感受到：這是一個正在「換軌」的時代。舊的國際敘事正在鬆動，既有的發展範式不斷顯露疲態；新的力量、新的理念、新的制度經驗，則在衝突、博弈與調整中逐漸浮出水面。本期《文化中國》所刊發的多篇文章，正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對當今世界格局、中國道路與思想傳統展開的系統性思考。它們既是對現實的回應，也是對未來的探問。

通觀〈卷首論語〉全文，可以看到一個清晰的思想主線：世界正在進入一個「後西方時代」，而中國正在以自身獨特的文明基礎與制度實踐，參與並塑造這一時代。不過，這種變化並不是一種「你輸我贏」的零和競爭，而是文明演進與現代性重構的新文明形態。「新型現代化模式」應該植根於深厚文明傳統、革命實踐與現代制度創新結合。這一體系在價值精神上，吸收並重構了三大思想資源：一是以仁義、公道、和合為核心的中華文化精神；二是以解放生產力、追求社會公平、反對兩極分化為旨歸的馬克思主義精神；三是以契約、法治、效率和責任為要義的現代市場經濟倫理。正是在這種多重思想資源的張力平衡中，中國探索出一種不同於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運行邏輯。

從思想史與學術反思的角度看，〈商鞅辯誣之誤〉對商鞅變法等思想與制度傳統的再審視，提醒我們區分「秩序」與「正當性」、「效率」與「正義」、「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真正值得繼承的，並不是簡單的強制與控制，而是如何在制度建構中尊重人的尊嚴、激發人的主體性、引導社會走向可持續的良性秩序。這種反思，本身就是一種成熟文明的標誌。

與此相呼應，本期的〈專題對話〉對新儒學到陳來的發展，展示了另一種面向未來的思想可能。通過對「體用不二」、「仁學本體論」、「本體詮釋學」等理論的系統呈現，闡明中國思想傳統並非只能停留在倫理勸誡層面，而完全可以發展出回應

現代性問題的形上學與價值論體系。這不僅是對中國哲學自身的重建，也在全球思想舞台上，為人類文明提供另一種理解世界、安頓人生的思想方案。此外，中國思想傳統的倫理勸誡也不僅僅在個人修養和社會政治秩序中發揮作用，在現代的企業管理和商業社會中同樣需要儒家商道智慧。本期〈儒商文化〉欄目中的三篇文章都在探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現代企業管理理論的有機結合，以期開創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的中國管理哲學自主知識體系。

將這些文章放在一起閱讀，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個共同指向：無論是國際秩序的重構，還是國內發展的轉型；無論是制度實踐的探索，還是思想傳統的再闡釋，其核心問題始終是一人類應當走向一種什麼樣的現代性。

在這個歲末年初的時間節點上，全球範圍內的戰爭陰影尚未散去，經濟復甦仍顯乏力，技術革命在帶來效率躍升的同時，也加劇了不平等與不確定性。國內發展同樣面臨多重挑戰：結構調整的陣痛仍在釋放，人口、資源與環境約束更加凸顯，社會心態與價值觀念處於深刻變動之中。然而，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所展現出的長期主義、系統思維與文明自覺，愈發顯現其意義。

中國的發展道路已經反覆證明，真正可持續的現代化，既不能脫離世界，也不能喪失自我；既不能否定傳統，也不能拒絕創新；既需要制度的剛性，也需要價值的溫暖。只要堅持以人民福祉為根本尺度，以文明連續性為深層支撐，以開放合作為基本姿態，中國就完全有能力在風高浪急的時代環境中穩步前行。

新春在即，萬象更新。我們期待，2026年的世界，能夠在對話中減少誤解，在合作中化解對立；我們也期待，中國能夠在持續改革與深化反思中，進一步完善自身的制度形態與思想表達，為人類文明的多樣發展貢獻更多可供借鑒的經驗與智慧。